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六辑

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北 京 出 版 社

文 史 资 料 选 编

第 十 六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印 刷 一 厂 印 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195,000字

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

书号: 11071·177 定价: 0.85元

(内 部 发 行)

文史资料选编 第十六辑 目 录

血溅金陵忆当年

——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雷洁琼（1）

劳山遇险·····刘九洲（42）

一个革命母亲的典范

——回忆廉维同志·····高 炎（47）

我所知道的张伯驹先生·····张琦翔 遗稿（58）

朱桂辛先生二三事·····刘宗汉（68）

戊戌变法时期的“三黄”·····黄宗淮（81）

中国天文学会和北京古观象台·····陈遵妣（85）

日本投降后戴笠来平情况琐记·····文 强（109）

回忆通县私立潞河中学·····陈昌祐 刘汝英（130）

北京私立崇德中学·····李瑞启（142）

北京市第四中学·····温炳炎（157）

回忆北京师范大学平民学校·····刘猛百（177）

一识鼓王 五学《截江》

- 和刘宝全先生学艺的一段回忆……………魏喜奎 (184)
- 略谈北京曲艺……………靳 麟 (200)
- 北京的评书……………靳 麟 (205)
- 葡萄常……………常玉龄 (221)
- 我的面塑艺术生涯……………郎绍安 (234)
- 望江南词……………寿 森 遗稿 (247)

血 溅 金 陵 忆 当 年

——一九四六年“下关事件”亲历记

雷 洁 琼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上海和南京，这是一个寻常的、晴朗的夏日。但是，在我迄今为止的七十七年的生活中，这却是一个最难以忘怀、激动人心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在蒋介石政府发动全面内战的阴影笼罩下，由中共地下党发动和组织，以马叙伦为首的上海市人民团体代表团(共九个代表，当天成行的有八个代表；另有学生代表二人)，前往南京请愿要求和平。我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上海北火车站，成千上万的群众聚集在一起(一说五万人，一说十万人)，隆重欢送代表团赴京请愿，使我深受感动。当天我们抵达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刁难、阻挠和毒打，我也被打伤。这就是当时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事件发生的当晚，正在南京和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同志亲自赶到医院慰问我们；不久，毛泽东、朱德同志又发来电报表示慰问；全国人民的同情都投向我们，全国的进步舆论都声援我们。从这一天起，我的眼界更加开阔了，我同人民群众靠得更近了，我的心跟着党的心一齐跳动。这一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三十六年，但是，许多当初的情景

依然历历在目，有时就象“过电影”一样。近来，我有机会请教了当年上海地下党的一些领导同志，使我得悉一些当时属于高度机密的内部情况，对“下关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今天，参加请愿的九位代表中，马叙伦、费延芳、包达三、张纲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七位同志已经作古，幸存者只剩下胡厥文同志和我。胡老已经九十岁出头，而且他由于迟到，没有碰上“下关事件”，因此，我这个相对来讲的“年轻人”、事件全过程的参加者，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把这一段史料回忆、整理出来，并就教于各位知情的同志。

历史的背景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蒋介石急急忙忙跑下峨嵋山，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他大搞反革命两手：一面玩弄和谈阴谋，邀请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一面依仗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支持，调兵遣将，蓄意发动内战，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吞掉。与此同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兴起了一个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人民运动。两股势力进行着激烈的搏斗。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召开有中国共产党和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会上通过了决议，发布了停战令。但旧政协决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集团就悍然调动了上百万的大军向解放区进攻。一九四六年上半年，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眼看内战即将全面爆发。到这年

的六月，蒋介石集团由于在军事上连遭挫折，需要喘息时间作全面准备，部署新的进攻，于是又提出自六月六日起，在东北战场上停战十五天。到六月二十一日，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的压力下，蒋介石政府又宣布将东北停战令延期八天，到六月三十日为止。当时，中国共产党为了制止内战危机，派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在南京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和谈。美国政府则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进行“调解”。

这次停战和谈，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全国人民十分关心。上海地下党根据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一方面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的打算；一方面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开展一次要求和平、反对内战的人民运动。六月上旬，先由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地下党员，已去世)、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要求制止爆发全面内战，要求美国政府停止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与此同时，也写了一封信给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蒋介石对此置之不理；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团员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则联名复函马叙伦、陶行知等，表示支持反对内战。全文如下：

夷初、行知诸先生大鉴：

顷奉惠函，并承示上蒋主席书。雒诵回环，弥觉辞危而情苦，感人至深，曷胜钦仰。窃以中国政事之败，民生之苦，于今已达极点。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之好战分子，依然恃美国武器之资助，积极进行全面反共之内战。设使此辈得逞，则域内势成糜烂。是以敝党于国内一切冲突，夙主无条件停止。盖唯有停止国内武装冲突，民主团结才有途径可循。谈

判以来，即坚持此旨。以此之故，卒在广大人民之呼吁与马歇尔将军努力之下，获得东北停战十五日之结果。姑不问国民党当局于此诚意若何，敝党决愿本一向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之职志，进行谈判，并盼能从此长期停战，永息戎争，俾使政协决议整军方案得以顺利实行，斯为国家之福，人民之幸。惟前途困难正多，尚祈诸先生再接再厉，制止内战，挽救国运于阽危，张民主之大义。时迫事急，临颖不尽。除遵嘱将函转陈毛泽东同志外，专此肃复。

顺致

时绥

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邓颖超敬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地下党决定酝酿组织一个上海各界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去南京请愿，揭露蒋介石集团假和谈、真战争的狰狞面目，在政治上给敌人一个打击，以配合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和谈斗争。

走出象牙塔

我是一个受西方教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我能参加党所领导的人民运动，亲身受到“下关事件”的战斗洗礼，主要是受爱国主义和正义感的驱动，是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的。

一九三一年，我二十六岁时在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毕业，取得硕士学位。我学的是社会学。我曾天真地认为：“中国又贫又弱，社会弊病太多。研究好社会学，一定可以找到医治社会弊病的良方，使中国富强起来。”学成回国后，我不禁为疮痍满目的

祖国大地感到震惊。我能为国家、为人民做什么呢？我接受了美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的聘任从事教学工作，认为教育可以救国。但我眼看着不合理的社会却束手无策。回国后仅仅两个星期，“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日寇入侵，国土沦丧，同胞被杀，全国人民无不热血沸腾，怒火满腔。我和郑振铎、顾颉刚、高君珊、马鉴等教授一起，组织了抗日救国会，积极募捐为前方将士做棉衣、棉手套，送往东北，送往古北口，送往上海十九路军。但是，蒋介石政府却采取极端反动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把装备精良的部队调去“围剿”红军，忙于打内战，而对豺狼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到一九三五年，日寇已经把我国的东北三省、热河（现河北北部）和河北东北部（冀东二十二县）的大片土地囊括而去。从北平沿铁路线，经天津、唐山直到山海关，驻扎着日本的“华北驻屯军”，他们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欺压、奴役中国人民。而蒋介石政府却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发布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取缔一切抗日团体，不许人民爱国。我们气愤之极，感到要做亡国奴的危险，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正当我愤怒、迷惘、困惑的时候，一九三五年的冬天，轰轰烈烈的“一二·九”运动在北平爆发了。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和革命朝气感染了我，激励了我，把我卷入了群众游行的队伍。我走在燕京大学的游行队伍中，从海淀经西直门走到西便门，亲眼看到学生们用大木头撞开城门，看到学生们冲破全副武装的军警的防线胜利前进。我佩服学生的勇敢爱国行动，我将救中国的希望寄托于爱国青年。后来，我从爱国青年中看到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我开始认识中共是爱国抗日的，但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封锁和歪曲宣传，我尚不了解中共的组织和目标。

抗日战争中，我在江西从事抗战救亡活动，走出了象牙之塔。我同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负责人陈少敏同志有来往，得到她不少的教益和支持。我同不少爱国青年共事合作，其中有些是共产党员。通过他们，我能看到进步的书报杂志。我的视野开阔了，政治觉悟提高了。后来，由于政治形势不容许我在江西继续工作，我转到沦陷区的上海教书。敌人的凶残，汉奸的无耻，人民的苦难，亡国的危险，使我忧心如焚。这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上海组织了两个“聚餐会”：一个是“星二聚餐会”，参加者多为文化界人士；一个是“星五聚餐会”，参加者多为工商界人士。“星二聚餐会”每星期二在上海南京路新新公司肖老板家中举行，每人每次交一元聚餐费。会上，由地下党组织人报告战况，分析国内外形势，有时还介绍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根据地的情况。这个聚餐会的核心人物有陈已生(以后入党)、林汉达、冯宾符(党员)、郑振铎、许广平、赵朴初等，我和我的爱人严景耀也是这个聚餐会的经常参加者。这个聚餐会实际上是党领导的统一战线中的一个外围的进步政治组织。通过这个聚餐会，我们间接地接受党的领导。我和党的关系密切了。

组成请愿团

抗战胜利后，党领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蓬勃发展。那时，旧政协将要召开，国共两党将要进行和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要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以“星二聚餐会”的人员为基础，由马叙伦、王绍鏊(党员)、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党员)、赵朴初、陈已生(当时已是党员)、梅达君

(党员)、谢仁冰(章汉夫的父亲)、张纪元(党员)、柯灵、严景耀、雷洁琼等二十六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一九四六年五月，为了扩大争取和平民主力量，进一步开展反独裁、反内战、反美帝的斗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中国民主促进会和上海纺织业、丝织业、机械业、水电业、棉纺业、百货业、酒菜业等工会以及妇女、文化、医药、银钱、教师、学生等各界四十七个主要人民团体(以后又发展到六十八个)联合组成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代表各界群众四十万人。第一届理事共二十九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成员马叙伦、王绍鏊、林汉达、陈巳生、梅达君、徐伯昕、许广平、周建人、冯少山、葛志成(党员)当选为理事。代表其他方面当选理事的还有沙千里、闵刚侯、沈肃文、沈志远、胡厥文、孙晓邨、罗叔章、盛康年、胡子婴、汤桂芬、韩武成、秦柳方、甘田、蒋学杰、叶克平、王本鸣、李传庆、彭文应、赵家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理事会议决将向有关各方呼吁停止内战，并请美国政府莫再以军火资助任何一方，中国的问题由中国人民自己决定。还决定反对上海市警察局实行法西斯的“警管区制”。然而，蒋介石集团倒行逆施，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竟然扬言要在三至六个月的时间内全部消灭人民解放军。在这种情况下，六月上旬，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决定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并推举九人组成代表团赴南京请愿，呼吁和平。

六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在上海八仙桥一家饭店吃饭并开会，共到十余人。除胡厥文外，参加代表团的人员都到了。马老(叙伦)在会上宣布：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各团体经过协商，推举马叙伦、胡厥文、龚延芳、包达三、张纲伯、盛丕华、阎宝航、吴耀宗、

雷洁琼九人为和平请愿代表，另由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选出两位学生代表，他们是陈立复、陈震中(陈巳生之子)，共十一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和平请愿团)去南京请愿。马叙伦被推为代表团团长。罗叔章、胡子婴为代表团秘书，罗作为先遣人员已在南京筹备。大家还一致推举吴耀宗写英文备忘录，以便面交马歇尔。会上还商定了请愿的策略：代表团到南京后要向国、共、美三方提出要求和平，不给敌人以口实。当然，明眼人可以看出，代表团斗争的锋芒是指向蒋介石集团的。

代表团名单及身份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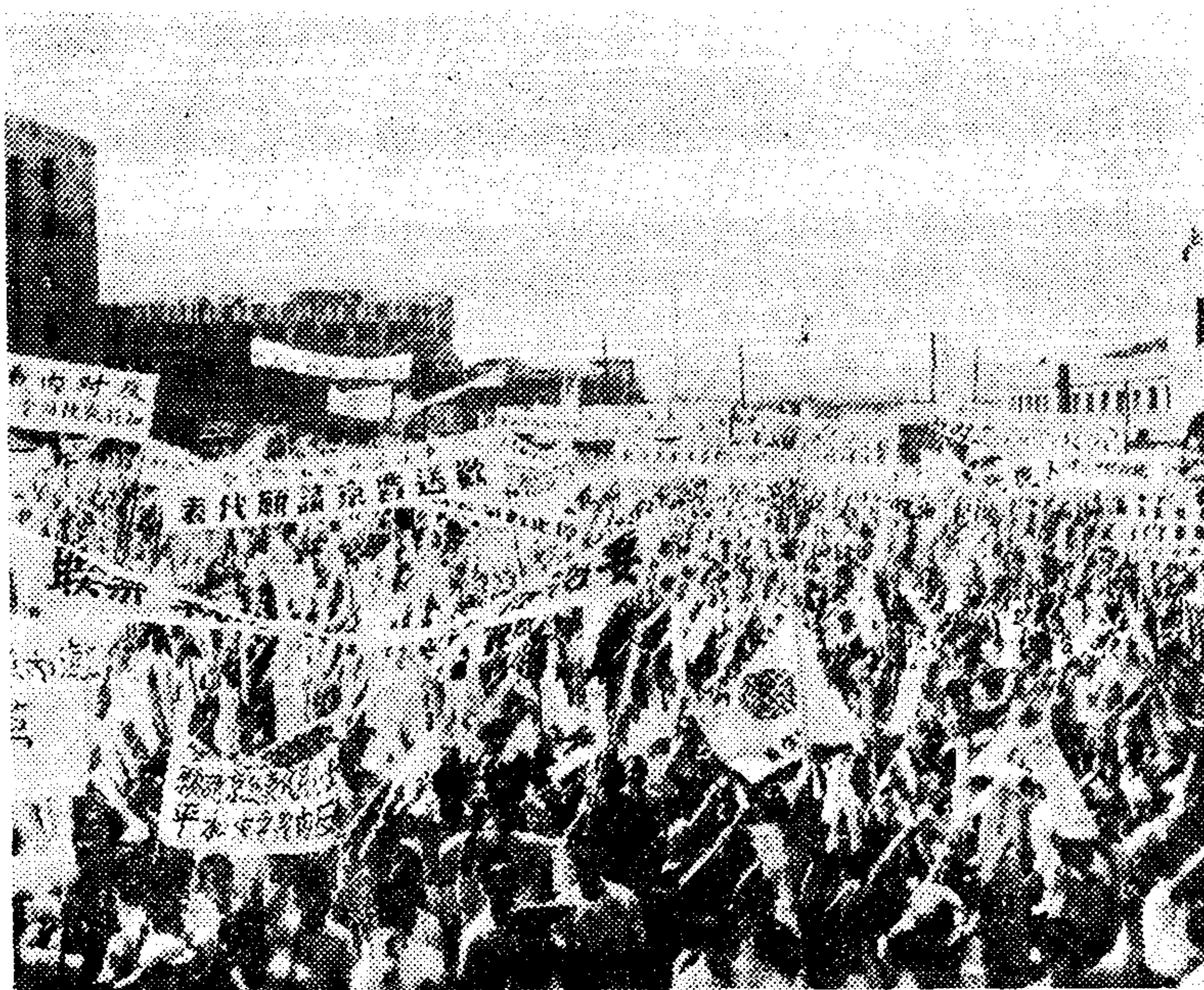
马叙伦	前代理教育部长、北京大学教授
胡厥文	合作五金厂总经理、迁川工厂联合会主席
黄延芳	浙江兴业银行董事、大生纱厂董事、丰盛实业公司董事、四明医院董事长、上海名人
包达三	雷石化学公司董事长、信仪地产公司总经理
张纲伯	中兴实业公司董事
盛丕华	上元企业公司董事、开美科药厂董事长
阎宝航	大明公司总经理、东北知名人士
吴耀宗	翻译家、基督教全国青年会总干事
雷洁琼	东吴大学教授
陈立复	东吴大学学生、学生会主席
陈震中	圣约翰大学学生、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主席

代表团的九名正式成员，有五人年逾花甲(马叙伦、黄延芳、包达三、盛丕华、张纲伯)。我当年四十一岁，是代表中最年轻

的。其余胡厥文、阎宝航、吴耀宗都已年过半百。九人中除阎宝航是地下党员外，其余都是非党人士。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虽然都是地下党员，但他们的活动大都和我们分开。蕢延芳先生早在蒋介石混迹于上海交易所的时候，就和蒋介石熟识。据说，抗战胜利后，蕢经常派人从上海送鲜鱼去南京给蒋介石。这说明他们是有交情的。蕢延芳先生是位有正义感的老人。他目睹内战危险迫在眉睫，国家危机十分严重，因此乐于参加代表团去争取和平。

在北火车站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天）早晨八点钟左右，我们代表团的成员（胡厥文因事当天未能成行）就到达上海北火车站。我们买的是上午十一点的快车票，但因为预定要在北火车站开一个群众性的欢送会，所以我们都提前到了。我们到达时，已经有一队队的人群聚集在北火车站周围，他们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手执各种小旗，有的唱歌，有的呼口号。我们到后，欢送的队伍象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向北火车站周围。站内站外，人山人海；月台两旁，万头攒动。北火车站成了人的海洋。后来有的报纸估计欢送人群有五万人，有的估计为十万人。谁也没法去清点数目，但形容为人山人海是不夸张的。人群里有数不清的标语、旗子、横幅、漫画等。上海市电话局职工一幅大标语使人印象最为深刻，那上面只有八个字：“内战不停，电话不灵！”到车站送行的知名人士有陶行知、许广平、周建人、叶圣陶、林汉达、王绍鏊、田汉、吴晗、沙千里等。



上海北火车站前群众欢送去南京请愿的代表的热烈场面。

十点钟，欢送大会宣布开始。上海市学生和平促进会的两辆宣传卡车停在火车站口，作为临时主席台。上海百货业的铜管乐队奏起了《反内战》乐曲（袭用《打倒列强》原谱），一位青年站在主席台上挥动手臂指挥，几万人跟着唱起了雄壮的歌：

反对内战，反对内战，
要和平！要和平！
全国同胞起来，全国同胞起来，
要和平！要和平！

欢送会的主席团由王绍鏊、林汉达、陶行知三位组成。王绍鏊首先致词，他说：欢送人民代表赴京请愿，不是争取和平运动的结束，而是开始。假如这次不成功，将来还要第二批、第三批接着去京请愿，直到和平实现为止。全场群众跟着呼喊“去！去！去！我们都去！”

我们赴京请愿的九个代表，大都年事已高，马老（叙伦）那年已经六十二岁。为了防止过于疲劳，大家推举蕢延芳先生和我给欢送群众讲话，其他代表都先上了火车。蕢延芳先生接着讲了话，他答谢上海各界的热情欢送，说：“中国一定要和平，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把青年学生打老了，我们老头子打死了，工商业打垮了，中国就打亡了。再打下去，真是不堪设想了。”我应邀讲话说：“看见这么多人欢送，增加了我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无限勇气。但是，我个人力量很小，希望大家更团结努力。”

接着，陶行知先生讲了话。他说：“八天和平不够，我们要永久和平。和平与民主不可分。我们要十分的和平，也要十分的民主。中国再打下去就要亡国了，不愿做亡国奴的联合起来！”林汉达先生手执大蒲扇走上讲台，对着扩音器很诙谐地说：“九位代表（按：代表团共有九名代表，但这天到场的只有八名代表）不仅是上海人民的代表，也是全中国人民的代表。为什么？因为现在全中国人，不管哪一个，除掉少数好战分子外，没有一个人愿打内战。中国的主权是属于全国人民的，政府的官吏只是主人的仆人。今天为什么不是主人当政，而是仆人当政呢？抗战以前，政府对日本非常稳健，那时也是学生和人民北上南下的到南京请愿，要求抗战。今天这九位代表去，要吩咐仆人立刻放下武器。”这时，会场沸腾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停了一会儿，林汉达才

接着说：“我们要争取和平，争取民主。我们不能让仆人把主权送给外国人，我们更希望外国人帮助中国实现和平，不希望用飞机大炮来帮助中国打内战。国家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不愿意再打内战。现在我们的代表到南京去请愿，假如不成功，我们就第二次再去，我们全上海的人都去，我们步行去，非达目的不可！”这时，掌声雷动，群众在烈日下有节奏地高喊：“去，去，步行去！”台上台下沸腾起来，到了极点。

学生代表陈立复、陈震中也被热烈欢迎讲了话。他们呼吁当局减少军事开支，增加教育经费，并表示赴京请愿不达反内战的目的决不罢休。

最后，吴晗（西南联大教授）讲话说：“今天是民众抬头的日子。最后决定权属于人民。谁敢再打内战，一定被人民唾弃。这次人民代表晋京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而且永远不许失败。”他提高声音又说：“上海市人民是和这八位代表站在一起的，请吴市长（按：指当时国民党政府上海市长吴国桢）来看看今天的大会，是否能代表民意？！”讲话结束后，南洋女中学生代表走上主席台，赠给我们赴京请愿代表一面锦旗，上面绣有“立刻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字样。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会议结束时，通过了四项决议：一、成立全国争取和平联合会；二、和平谈判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三、第一批请愿不成第二批第三批再去；四、通电美国政府，希望不要帮助中国打内战。

大会结束，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群众簇拥着我们走进车站。成群的中外记者跟着我们采访，美国福斯制片公司派人来拍摄了现场实况。车站成了五采缤纷的标语的海洋。最多的标语是“反对内战，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和平”、“保障人民自由”



代表团全体成员在上火车前合影。右起：马叙伦、包达三、雷洁琼、阎宝航、张纲伯、盛丕华、胡子婴、费延芳。吴耀宗在照相时适不在场，胡厥文因事当天未能成行，因此吴、胡二人未参加照相。

等。我们走到月台，看到车厢、车窗、车顶上也贴满了标语和漫画，其中有一条大标语特别令人瞩目：“内战若不停止，全国同归于尽。”当然，也有两条唱反调的大标语，一条写的是“打倒马叙伦”，一条写的是“打倒林汉达”，挂在北火车站的站口，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国民党特务搞的。这两条标语尽管布幅很长，字也不小，但是孤零零的，显得既可笑又可怜。

许广平大姐一直送我到代表团乘坐的头等车厢旁（两位学生代表乘坐另一节车厢，大概是硬席）。她对也来送行的我爱人严景耀说：“假如雷先生去请愿不成功怎么办？”严景耀幽默地回答